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施蛰存：前卫的现代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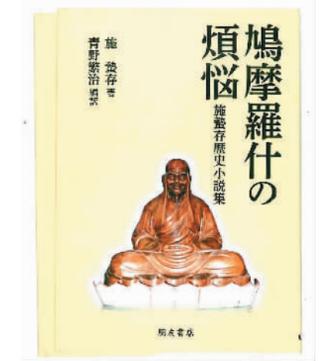
杨迎平

施蛰存是现代著名小说家、诗人、学者、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小说集《上元灯》《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000多万字，与朋友一起办“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和“东华书店”，出版《兰友》《瓔珞》《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文艺风景》《文饭小品》等多种刊物。施蛰存最大的贡献是，使心理分析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编辑的《现代》杂志成为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

但对于这位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国内的研究起步却并不早。以至于施蛰存在1991年8月9日给笔者的信中说自己是“出土文物”，“想不到近年忽又‘走红’，亦颇感青年人好奇好古”。最早最有影响的研究，是吴福辉发表在《十月》1982年第6期的《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春阳〉》，肯定了“施蛰存小说不乏佳篇”。之后是严家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年第1期的长篇文章《论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1987年，钱理群等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最早让施蛰存的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出现，该书在“海派小说”一节中论述了施蛰存“由人的内在生命来表现人性，表现男女情爱”，说他的心理分析小说在上世纪30年代堪称独步，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比之下，海外对施蛰存的研究要早得多，尤以英语世界学者的研究最为突出。

关注现代性因素

英语世界关于施蛰存的研究专著有多部，研究论文有数十篇。较早开始施蛰存研究的是学者夏志清1961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从介绍《现代》杂志到介绍施蛰存，认为该杂志主编施蛰存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小小说家。夏志清评价施蛰存在《将军底头》和《石秀》等小说里，对著名历史人物和传奇人物作弗洛伊德式的研究，并认为在他明智的编辑方针下，《现代》杂志对促进严肃文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日本出版的《烦恼的僧人》施蛰存历史小说集

◎新作评介

让少年回归“少年”

赵振杰

在文学语境中，“少年”一词不单纯是一个生理年龄的概念，它同时蕴含着某种特定的价值认同与社会共识。因此，每当我们谈论“何为少年”时，往往也在同步谈论着“少年何为”。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先生曾以极尽溢美之辞称“中国少年”为“腾渊之潜龙，啸谷之乳虎，试翼之鹰隼”。然而时至今日，作为国之骄子的理想型“少年”正在被“鸡娃”（父母给孩子“打鸡血”）、“青蛙”（普通孩子）、“牛娃”（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素鸡”（接受“鸡娃”型素质教育的孩子）等网络流行词所取代。从“少年”到“鸡娃”，青少年成长教育的变动和百年前比，不可谓不大。而姚鄂梅的长篇新作《少年前传》（《十月·长篇小说》2021年第5期）所要直面的正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背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当代教育难题。

小说用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分别讲述了三位“中产宝妈”的“育儿心经”。吴天妈妈自觉继承了家族由来已久的家教家风——“吊大的葫芦打大的娃”“男孩不打不成才”。为此，她还煞有介

献，揭示了施蛰存创作的特点和地位。美国学者李欧梵及其高足史书美对施蛰存的研究最有影响，也最深入。他们专程从美国到上海对施蛰存进行采访，得到很多第一手资料。李欧梵199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中，用第四、五两章5万多字篇幅论述施蛰存。第四章“文本置换：书刊里发现的文学现代主义”从《现代》杂志入手，肯定了施蛰存的前卫与先锋，认为施蛰存的作家朋友圈“是出于相似的教育背景和语言专业所培养的强烈的艺术感性走在一起的”，他们是世界主义者，更为“前卫”。第五章对施蛰存的小说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说他“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家”。李欧梵认为，“作为一个有原创性的作家，他（施蛰存）是一个先锋，一个拓荒人，因为他敢于深入全然陌生的人的内心世界，并大胆地回眸那无理性的力量”；施蛰存用弗洛伊德、葛理士等人的理论和西方文学作品的思想资源，呈现出“一个既现实又是超现实的世界”。

史书美采访施蛰存后，2001年出版专著《现代的诱惑：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写作（1917—1937）》（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用近3万字篇幅研究施蛰存的小说，认为他为现代主义小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次生文类。史书美还说，中国文学现代主义中的内在性与心理分析紧密相关，施蛰存小说中现代都市男人的情绪心理体验“恰好体现了心理分析学说的相应维度”。

王一燕的《施蛰存短篇小说集中的Flâneur》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Flâneur”，在法语中是“都市漫游者”的意思。文章认为，施蛰存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虽然类似法国文学中的“Flâneur”，但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突出的流浪汉形象产生了共鸣。作者进一步指出，施蛰存的短篇小说是本土现代主义的典范，同时也带着多种文学传统的印记。韩国外国语大学金顺珍的文章《朴太远和施蛰存对首尔和上海的都市认识》，也关注到作家笔下的现代都市经验。作者以20世纪30年代分别在韩国和中国从事创作活动的现代主义小说家朴太远和施蛰存为研究对象，认为二人以首尔和上海的都市空间为创作背景，形绘出别具一格的都市风景。

对历史小说情有独钟

日本学者青野繁治对施蛰存的历史小说情有独钟。2018年，他翻译了施蛰存的历史小说集《鸠摩罗什的烦恼》，由日本朋友书店出版，收入《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阿盖公主》《李师师》《黄心大师》6篇历史小说。1987年2月，青野繁治发表了分析施蛰存历史小说的论文《施蛰存〈鸠摩罗什〉——以及它的虚构过程》，“探讨施蛰存小说处理文学的虚构和历史框架关系的问题”。在论文《由历史小说看施

蛰存的方法意识》中，青野繁治再次论述相关问题：“我所关注的是作家处理‘历史’题材所表现出的方法意识或者对虚构的认识问题。”认为施蛰存的历史从不“借古讽今”，而是“对历史做新的阐释”。他说：“施蛰存历史小说的特征，是吸取历史题材的同时，根据心理学在作品中大量融入详尽的心理描写。他在注重叙事性的历史故事中加入西洋式的心理描写，他的作品也可以称为历史心理小说。他所描绘的心理是现代的，然而不仅现代人，现代以前和过去的人也可以发现有这种潜在的心理。”这堪称知音之论。

捷克学者马里安·高利克的文章《现代中国文学的社会和文学气质》叙述了施蛰存对爱·坡的偏爱及其历史小说所受的影响，认为施蛰存的《将军底头》《鸠摩罗什》中，都对历史和传说人物进行了弗洛伊德式的描述。作为《现代》杂志的编辑，施蛰存在英译本中表达了对法国现代文学和超现实主义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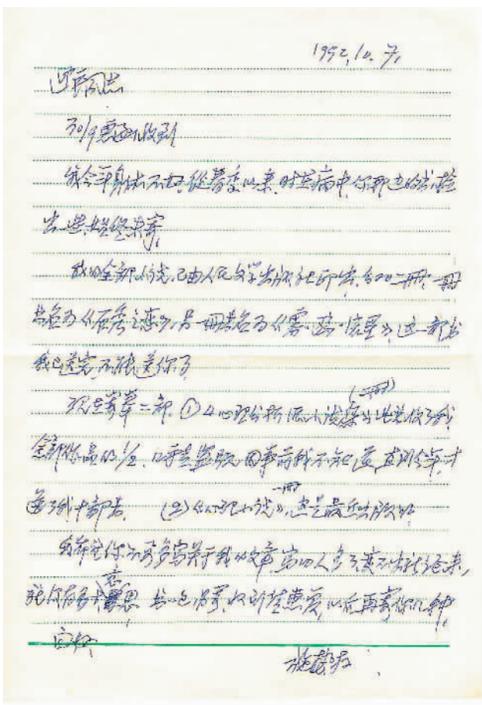
美国研究者克里斯托弗看到了传统文化元素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影响。克里斯托弗2017年在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主义的边缘：徐訏、无名氏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在专章“施蛰存与穆时英的传统与混杂”中，重点比较分析了施蛰存和穆时英如何将传奇、传统和神话融合进创作。

重点研究施蛰存历史小说的还有埃琳娜·希德维吉奥娃的《颓废的继续：施蛰存与法郎士作品中的爱欲和孤独》、张京媛的《心理分析在中国：文学变形 1919—1949》、威廉·奇科夫的《鸠摩罗什的外语：施蛰存的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王娟的《欲望、残缺、神性——施蛰存历史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困境》等。

与海外学者互动

施蛰存有很多海外朋友，辜健编辑出版的《施蛰存海外书简》，收有290多封施蛰存写给海外学者朋友的信件，其中交往最频繁、探讨最深入的应该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与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中文版序中



施蛰存1992年写给本作者杨迎平的信。

说，他是1979年听夏志清谈到施蛰存的。“夏志清教授提醒我：早在30年代上海就有一本名叫《现代》的杂志，也有人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写小说……夏先生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此，李欧梵开始频繁采访施蛰存，《施蛰存海外书简》收录的9封施蛰存给李欧梵的信，记录了他们的交往细节。此外，李欧梵还出版了《现代性的追求》，其中有专章“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比较分析上海新感觉派的异同。

孙康宜在1984年开始与施蛰存交往，他们的交往从词学研究开始。1980年，除教学工作外，施蛰存开始筹备创办《词学》。1981年11月，《词学》从刊第一辑于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当时词学研究的空白。为了增强词学在海外的影响，施蛰存在该刊开辟了海外专号，请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教授孙康宜在海外约稿，从此二人有了长达10多年的通信与交往。孙康宜将两人的70多封信件汇集为《从北山楼到潜学斋》出版。在她的专著《词与文类研究》序言中，孙康宜特别感谢施蛰存对她的指导与帮助。孙康宜还写了研究施蛰存的文章《施蛰存的西行逃难诗》和《施蛰存的诗体回忆：〈浮生杂咏〉八十首》。美国耶鲁大学还把施蛰存的《唐诗百话》作为东亚语文学系研究生的中国文化教材，扩大了施蛰存作品的海外影响，使其成为更多学者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及施蛰存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相伴相生。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叙事艺术的特性就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个陌生人如何邂逅？邂逅后如何发展关系？是必须要做出安排和交代的。一般来说，邂逅的地点总是那些人群涌动的公共空间，比如电影院、咖啡馆等。有很多故事，作家把他们最初的相见安排在公共汽车上。

为什么作家喜欢让故事里的人物在公车上相见？公车安排和交代的。一般来说，邂逅的地点总是那些人群涌动的公共空间，比如电影院、咖啡馆等。有很多故事，作家把他们最初的相见安排在公共汽车上。

在波兰斯基的《苦月亮》中，作家和少女最初的相见就是在公车上。巴黎的秋天，公车上的少女美丽而忧郁，仿佛天使。检票员来查票了，但少女没有车票，这时，坐在一旁的作家把自己的票偷偷塞进少女手中，替少女解了围……作家在公车上见到少女，宛若窥见上帝的杰作，此后便无法忘怀。直到多年后，他又在巴黎街头邂逅，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就此开始。

这类关于公车上的经典场景，在电影和小说中可谓数不胜数。

我最近出版的新书《演唱会》里有一个短篇《小偷》，其中一个片段就是一个小偷和一个少女在公车上相遇。我写这个故事时，深切感受到现实与艺术世界的区别。在现实的公车上，小偷永远是可恶的。但小说有自己的逻辑，它关注的往往是一种可能性。我的这篇小说里，公车上的场景变得比较浪漫了：“小珊喜欢坐这路公车，这里有一种她喜欢的落寞的气息……”然后，小偷出现了。小偷英气逼人，她不觉对他有了好感。但令她失望的是，他却向一个乘客伸出了手，当他的手退回来时，多出一个钱包。少女安静地看着他。小偷回头时看到了她的眼神，最初很慌张，但她没喊，只是静静地看着。“这时，小珊看到那个小偷从西服里拿出钱包，把钱包塞进了那女士的包里。他这么做的时候，还回头看了小珊一眼。那眼神里有一丝羞愧——也许不是羞愧。小珊非常吃惊……”

这个故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少女把小偷感化，一种是小偷把少女拉下水。后来如何？我在这卖个关子。总之，小说里小珊家有四位成员在一天不同时段都和这个“小偷”相遇。这是一个有趣的结构。不但亦实写的剧本暗示了女儿小珊正在发生的故事，他从窗口望到的场景似乎也和小偷有关。这是虚构的魅力，在这个尺度内，我们可以静观多重关系。

我个人喜欢这个故事，“小偷”在这里变成了隐喻，因为与小偷相对应的是，这个表面和谐的家庭实际上早已千疮百孔。我想追问的是，究竟谁偷走了我们的生活？

收在《演唱会》这本新书的短篇小说都是我的近作，包含了对无解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我一直觉得短篇小说是有力量的，我曾说过：“短篇小说不是现实生活本身，而是越出现实常规的产物，是这个正常世界的一次意外事故。当‘事故’发生时，我们才会正常世界，才会对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重新打量一番。顺着这‘特殊’的目光，我们麻木的神经有可能被小小刺激一下。”我希望小说集《演唱会》部分实现了我对短篇小说的理想。

艾伟



◎创作谈

打量习焉不察的生活

抒写百万移民的脱贫故事

蔡 闯



王建宏的《百万大移民》以文学表达，生动、精准地描述了宁夏西海固地区100多万移民从“贫困样本”向“脱贫样板”的艰辛跋涉和伟大转变，用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微小的场景、普通人的命运，折射新时代中国的脱贫攻坚壮举，反映大西北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

这是一部有体温的作品，它的每个故事、每个人物、每个词语都源于那些憎恨贫穷却又无奈于命运的普通人。作品写了他们的委屈、惶恐，更写了他们的抗争、奋斗。作者以现实主义眼光观察着生活的沉重，却不忘随时吹响一支浪漫的山歌小调，歌唱浇水盖房、小树新苗、上学就业和乡亲们还清了旧账的新日子。

王建宏写群众的事，说百姓的话，使这部作品与读者有了天然的共鸣。他与移民交朋友、和乡村干部唠家常，从南到北，把宁夏跑了一遍又一遍，把六盘山上的风雪、黄河岸边的滋润、大漠沙丘的绵延、移民村中的温暖、蔬菜大棚里的希望、修路引水时的期盼小心翼翼地灌注在作品中，生怕洒落一滴。作品写农民口粮、饮水、劳动、精神面貌的变化，也写产业升级、乡村环境整治。原来的场景是：“在跌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饿的西海固，人们最大的渴望，就是喝上清水、吃上白面。”当黄河水被引进移民村的田地，农民们的心情是如此欢快：“这黄河水从宁中到红寺堡，翻过一座又一座山，跨过一条又一条河，跑了100多公里，到了地里，怎么还这么欢实！”从绝望到充满希望的过程曲折艰辛，真实地反映这个过程也实属不易。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百万大移民》不是“丽以淫”式的夸夸其谈，而是“丽以则”式的言之有物，是有理性、有思考、有厚重感的应世之作。作者在为西海固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纵情讴歌的同时，也在质询贫困的根源、脱贫的路径。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紧密衔接的时代背景下，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过程中，王建宏在持续关注、思索和记录着。

（作者系光明日报评论部主任）

传》中有一个嵌套式的三角形结构，它构成了对当前教育困境的多重隐喻。这个三角结构的里层，是三位“宝妈”以爱之名建造的亲情牢笼，昊天、小素、子涵被禁锢其中。小说结尾处，昊天试图挣脱妈妈的情感绑架和观念束缚，独自一人踏上了远去的列车。然而，在黑暗的隧道中，仍有双“铜铃般的眼睛”紧紧跟着他。作者略带夸张的比喻实则给家长们的“鸡娃”式呵护敲响了警钟。

三角结构的外层则是学校“唯分是举”、校外辅导泛滥和教育深度“内卷”导致的“普遍焦虑”。三位“宝妈”因孩子在同一所课外辅导机构而结识，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进入重点初中，“宝妈”们大显神通，仿佛一场社会资源的“军备竞赛”。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昊天妈妈为消除“辱骂保洁员事件”对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主动上门向当事人赔礼道歉，谁成想，对方却提出了一个令其瞠目结舌的要求——将她乡下的孩子转到本市上学。由此可见，优质教育资源已成各方力量抢夺的焦点。

《少年前传》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不仅集中探讨了“鸡娃”攀比、家长焦虑、培训泛滥、唯分论等问题，同时还还将触角延伸到当前城市“密集养成”教育模式下家长与子女主体性迷失这重命题上。例如，小说中三位“宝妈”无不戴着一副“人格面具”，彼此相识6年，看似亲密无间，实则相互防备，最后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陌生起来。在孩子的成长教育中，父亲始终是

一个缺席的存在。在家长的过度干涉下，少年们或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双面人格”，或是日益变得自私利己。作品借此阐明：“鸡娃”式教育非但不能促进青少年人格主体性的建构，反而会成为个性发展的包袱。其危害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家长的反思。

幸运的是，《少年前传》关注的社会教育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只看分数；分数是一时之得，孩子形成健康成熟的人格才是一生的成长目标。这样的观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共识，让少年回归“少年”，既是作家姚鄂梅的期许，也是《少年前传》给予我们的启迪。

（作者系河北师大文学院博士）

